

□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战火中的“喀秋莎”

——谈卫国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侯 丹

DOI:10.16532/j.cnki.1002-9583.2015.04.003

苏联诗人伊萨科夫斯基在战争期间创作了一首诗歌《喀秋莎》,描写身处后方的年轻姑娘对前线恋人的思念和等待,在著名作曲家勃朗特为其谱曲之后,这首歌曲立刻传遍了整个苏联,成为前方战士最喜爱的歌曲,在战火硝烟的岁月里,他们唱着《喀秋莎》,想念着自己身处远方的亲人,“喀秋莎”这个名字成为爱与等待的象征。战争还赋予“喀秋莎”这个名字另外一层涵义,1942年初,一种威力极强的新型火箭炮投入使用,士兵们亲切地将这种火箭炮称为“喀秋莎”,喀秋莎的怒吼声成为德国军队的噩梦,却保证了苏联军队的胜利。战争使这个普通的女性名字具有了双重内涵,一方面是对亲人的无尽的爱,另一方面则是喷洒向敌人的愤怒的火焰。“喀秋莎”的双重涵义正是广大苏联女性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内心的真实感受。作为母亲、妻子和恋人,她们的等待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士兵的战斗热情,前线的每一个战士都把对美好重逢的期待转化为最坚定的战斗信念,为了保卫她们而血战到底;一些女性直接参与到了对敌斗争当中,她们就像“喀秋莎”大炮一样向敌人射出复仇的子弹,为了赢得胜利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爱与复仇是卫国战争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基本内涵。

—

复仇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行为方式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在古代,为血亲复仇是家庭伦理所要求的必要行为,为被践踏的家园和祖国复仇是人们自觉遵循的战争伦理法则。希腊神话里的复仇女神奈米西斯,“专门为那些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复仇,意为正义的愤怒、正当的法令、神的

复仇”。^[1]在奈米西斯身上体现了古老的伦理道德准则,即复仇的正义性。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个体的复仇受到了法律的制衡,而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对侵略者的反击仍然具有国际公认的正义性。卫国战争期间,施马林诺夫创作的一副宣传画表达了女性为祖国和亲人报仇的决心,画面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手里抱着刚刚死去的女儿的尸体,背景是正在熊熊燃烧的大地,在母亲坚毅的面庞上流露的不仅仅是痛苦和哀伤,同时也显现了内心深处复仇的渴望,宣传画上方的“报仇”一词如血一般鲜红。文学准确地捕捉到了战时女性的这一心理基调,复仇冲动成为许多女性投入战斗、参与对敌斗争的原动力。

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一部以年轻女性为主人公的经典之作。年轻的姑娘们虽然经历各不相同,但是都带着为祖国和亲人复仇的决心走向战场。班长丽达沉稳老练,执行任务时大胆果决、临危不惧,她的丈夫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牺牲了,为了报仇雪恨她加入了红军队伍;金发女郎冉妮娅开朗活泼、聪明而勇敢,她的妈妈、妹妹和弟弟都被敌人枪杀了,她也和丽达一样要在战斗中和敌人清算这笔血债,面对敌人她毫不退缩,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下河游泳迷惑敌人,最后为了掩护同志而牺牲;担任翻译的女兵索尼娅沉默寡言,她出身于犹太人家庭,战争爆发之后就失去了父母的消息,她深知面对施行屠犹政策的法西斯,父母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她把巨大的悲哀深藏在心里,不向任何人诉说,因为她很清楚,在灾难的岁月里没有幸福的人;来自乡村的李莎和爱幻想的嘉丽娅都在战争一爆发就立刻要求加入战斗,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抗击敌人,为祖国承受的灾难报仇雪耻。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这些姑娘全都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姑娘们的牺牲让华斯珂夫感到非常愧疚,面对垂死的丽达,他痛苦地说道,“为什么我不把这些个德寇悄悄放走,而偏偏要采取这样的决定呢?如果将来有人质问我:你们这些男子汉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妈妈保护好,使她们饮弹而死呢?你们为什么把她们交给了死神,而自己反倒安然无恙呢?你们是在保卫基洛夫铁路和白海运河吗?可是那边也有保卫部队,而且人数比五个姑娘跟一个带着手枪的准尉要多不知多少倍呀!我怎么回答他们的质问呢!”^[2]华斯珂夫准尉的自责反映了男性自古以来形成的战争责任观,作为一个男子,他认为保护女性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战场并不是姑娘们应该来的地方,她们理应和孩子们、和家人在一起呆在安全的地方。华斯珂夫准尉的愧疚表达了当时所有的男性公民对女性的亏欠感。在阿列克茜叶维奇的纪实性作品《战争中沒有女性》中记录了一个老兵的话语“我是个男子汉,战争是我的责任。而她们这些姑娘本该得到我们的庇护,却让她们去经历了这场战争。每一个前线老战士都会这样对您说。难道非把姑娘们送上战场不可吗?……我们所有的男人都欠了她们的债……”^[3]

作为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女性,姑娘们并不是被迫走上前线的,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她们自愿承担起这份沉重的义务,像男人一样扛枪走上战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女人的性别意义被弱化了。在这些女战士的心目中,自己与男性一样具有保卫祖国、抗击敌人的责任。丽达安慰华斯珂夫说,“祖国的疆界又不是打运河才开始的。完全不是。我们是在保卫祖国。首先是祖国,而后才是运河”。^[4]丽达抱着为丈夫复仇的决心走向战场,而在家庭伦理的背景之上是更高级的伦理道德情感,即对祖国神圣的爱与责任,血亲复仇的目的在于寻求原始的公平与正义,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尊严,正是这一崇高的情感促使她和她的女伴们不惜献出生命也要守卫脚下的土地。

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不仅前线是战场,在沦陷的城市里也同样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成功地塑造了两个优秀的女

共青团员——邬丽亚和柳芭的美好形象,她们在党的领导下和几名男共青团员一起组成了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在组织成立时她们的誓言充分表达了她们要为祖国和人民报仇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我发誓要毫不留情地为被焚毁、被破坏的城市和乡村,为我们人民所流的鲜血,为矿工英雄的死难复仇。如果为了复仇而需要我的生命,我将毫不犹豫地献出它。如果我因为禁不住拷打或是由于胆怯而破坏这神圣的誓言,那就让我的名字和我的亲人遗臭万年,让我本人受到同志们的严峻的惩罚。以血还血,以命抵命!”^[5]

复仇的决心同样激励着身处后方的苏联妇女,她们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这场人民战争。阿列克谢耶夫的长篇小说《不屈的小柳树》描写了战争时期女性在集体农庄里的艰苦劳动。战争爆发之后,扎维多沃村的壮年男子陆续上了前线,村子里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孩童。女主人公费尼娅的丈夫在欧洲战场上牺牲了,她成了村里第一个寡妇。随着苏德战争的全面爆发,村里的寡妇也越来越多,妇女们的等待和期盼都化成了流不尽的泪水。但是她们在遭到巨大精神打击之后并没有就此失去生活的勇气,而是继续照顾老人、抚养子女,参与集体农庄的劳动。亲人的死更加激发了妇女们报仇的决心,村里的老大娘安娜接连把丈夫和三个儿子都送上了战场,这样的奉献与牺牲丝毫不逊色于战场上的军人。妇女们为了支援前线组成了劳动大军,痛苦和灾难都没有让她们萎靡不振,泪水转化为复仇的火焰和劳动的激情,鼓舞着她们为了胜利而拼搏奋斗,作者通过这些妇女表现了蕴藏在人民之中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

在苏德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女性不仅与男子并肩战斗,同时也是前线战士的慰藉和灯塔。母亲的期盼、恋人的等待成为前方战士浴血奋战的最大动力。西蒙诺夫曾经写道: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明白——

只因为你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这首诗深刻地表达了后方亲人的牵挂对前线士兵的意义，这对他们来讲就是闯过枪林弹雨的护身符、挡住死神的盾牌。正是因为这一心理背景的存在，《喀秋莎》才成为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战斗歌曲。伊萨克夫斯基在诗歌中描写了年轻的姑娘喀秋莎对保卫祖国的恋人的思念，在梨花盛开的美好季节，美丽的姑娘站在峻峭的悬崖边眺望着远方，唱着相思的歌曲，赞美着守卫边疆的雄鹰。梨花、晨雾、春光，美丽的景色驱走了战争的阴霾，诗歌充满了明媚的乐观主义精神，站在悬崖边盼望恋人归来的喀秋莎成为众多苏联女性的象征，她们的存在点燃了战士们心中爱的灯塔，照亮了苏联士兵通往胜利的道路。

瓦西里耶夫的短篇小说《和平感叹号》讲述了后方女性对“爱”和“等待”的执着。尤里·特列齐亚绍夫中尉的未婚妻和母亲从他参军的那天起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战争胜利，尤里仍然活着，姑娘和他的母亲满心期待着他的平安归来。然而在胜利日过后，姑娘意外截获了一封写给母亲安娜·格奥尔吉耶芙娜的来信，信中告知她的儿子死在了一个德国小镇上。未婚妻向母亲隐瞒了这个消息，并且利用自己在邮局工作的便利定期发一封电报给母亲，上面写着“您的儿子的下落仍在寻找中”。她在得知尤里去世之后就一直和安娜·格奥尔吉耶芙娜生活在一起，肩负起儿媳的责任。在此后40年里，母亲每到5月9日就会搭乘电车到莫斯科去，“在高尔基公园里呆上整个白天。待到傍晚时分，她趑趄步入亚历山德罗夫公园，面向长明灯鞠躬后，将花束放到大理石墓基上，方才返回家中”。“她拄着根棍子，身上挂着块自制的小标牌，上面写着‘寻找儿子’几个字，还贴着一张几年来风吹日晒变得发白了的尤里·特列齐亚绍夫中尉的肖像”。^[6]哪怕到最后已经步履蹒跚、几近失明，她仍然没有放弃找寻的希望。如果这就是结局，读者固然会为母亲的等待和妻子对爱情的坚守所感动，但是却不会产生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小说的最后，作者进一步展现了女性深沉而坚韧的内心世界。在安娜·格奥尔吉耶芙娜去世之后，儿媳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正式的阵亡通知书，她忽然明白了婆婆早

已知晓了儿子去世的消息。而她这么多年从未放弃的找寻是为了保护儿媳和孙辈对丈夫和父亲的那颗期盼的心。

在小说的结尾处，“爱”超越了血亲伦理范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安娜·格奥尔吉耶芙娜的孙子尤拉决定带着自己的女儿和那块牌子继续安娜·格奥尔吉耶芙娜40年来所做的事情，只不过牌子上的字改成了“寻找父亲和爷爷”。此时，他们等待的已经不仅仅是尤里·特列齐亚绍夫中尉一个人，而是所有未曾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们。尤拉并不是安娜的亲孙子，而是儿媳在德国的孤儿院里领养的孤儿，这种爱已经超越了血缘与国籍的界限。她们虽然没有迎来自己的亲人，但是盼来了尤里中尉为之奋斗的胜利与和平。小说中的两个女性并没有做出任何英勇行为，但是却彰显了俄罗斯女性的隐忍、坚强与博爱的高尚品格，正是她们的坚守与期盼鼓舞着前方的战士，因为这种爱指向的并不是唯一的亲人，而是所有在战场上浴血杀敌的祖国儿女。

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记录了一位母亲为儿子和他的战友痛哭的场景，在参加儿子葬礼的时候，“她号啕痛苦‘我的儿啊！我可怎么带你回家去啊！你说说看，我们怎么替你娶亲啊……’”，“队伍肃立，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去打扰她。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发现牺牲的不只是他儿子一个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躺在地上。于是，她又为别人家的儿子放声痛哭起来‘你们，我的亲儿子啊！亲人啊！你们的亲娘都不能来跟你们说话，只好由我来为你们，为你们大家伙儿哭一哭……’”^[7]母亲没有忘记这些孩子是为谁而战，因何而死，她的眼泪说明这种爱并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血亲伦理范畴，而是代表了所有后方女性的悲痛。

三

女性因为与生俱来的敏感天性，对战争恐怖的感受要比男性更为强烈，残酷虐杀的战争和孕育生命的女性永远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对于走向战场的女性来说，杀人首先要克服的是伦理障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战士冉妮娅在杀死一个德国士兵之后立刻丢掉了枪，钻进树丛，

一边抽噎一边呕吐。华斯珂夫准尉见此情景没有去叫她,因为他知道“第一次肉搏总是折磨心灵的,它违反了‘不杀生’的自然法则”。^[8]沙米亚金在小说《新婚之夜》中也描写了女性在杀人之后的痛苦,女侦察员玛莎和游击队交通员瓦莉娅在进城的路上遇到了伪警,面对危险玛莎果断地杀死了伪警,但是事后她却不敢再向尸体看上一眼,她不停地用沙子搓着手,脸上没有了血色,变得非常虚弱无力。《战争中没有女性》中的狙击手克拉芙季娅回忆了自己第一次杀人之后的情景,“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人欠着腰站了起来,我手指一动,他就倒下了。您知道吗?我一个劲儿地哆嗦,全身乱斗。我哭了”。^[9]第一次面对敌人,女性总会不自觉地陷入伦理困境当中,复仇冲动和厌恶杀戮的天性之间的冲突使女性的心灵备受煎熬。华斯珂夫准尉安慰冉妮娅说,“你已经体会过了,以后还会有。有一点必须理解:他们不是人。不是人,战士同志,这群法西斯根本不能算是人。甚至,连牲畜也不如”。^[10]随着对敌经验的不断丰富,特别是在目睹了敌人的种种暴行之后,女性逐渐从伦理困境中解脱出来,狙击手克拉芙季娅在看见自己人被残酷杀害的场景之后,心理的罪恶感消除了,“从那以后,不管我杀死多少敌人,我都不动心了。当我看见这些烧焦的尸体时,我不能控制自己,心里只剩下愤怒和复仇的欲望”。^[11]女人的天性并不适合战争,在强敌入侵的时刻,她们不得不强迫自己适应战争,强迫自己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这种自我牺牲行为掺杂着深刻的伦理焦虑,因此在同样战功的背后,她们往往要比男性军人付出更多的艰辛。

没有走向战场的女性虽然不必承受杀戮的焦虑,但是战争的风暴常常把她们裹挟到另外的伦理困境当中。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描述了因为丈夫的过错而陷入伦理困境的女性的悲剧。女主人公娜斯焦娜的丈夫安德烈从前线开小差逃跑了。他偷偷摸摸地回到了家乡,藏匿在了村子附近。当家里的斧头和滑雪板消失时,娜斯焦娜凭借女性的直觉和妻子的本能猜到了安德烈就在附近。他们的会面并没有让娜斯焦娜感受到重逢的欢乐,她甚至为此而感到羞愧,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丈夫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在丈夫

去前线之后,娜斯焦娜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一样积极参与集体农庄的劳动支援前线,种粮、伐木,干着最繁重的活计却从不叫苦,虽然生活艰难但她仍怀着美好的希望,盼望着战争结束后能和安德烈重聚,重新过上和平的生活。但是这一切期待都因为安德烈开小差而化为泡影。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娜斯焦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在人群中她完全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她既不能和人家说话,也不能和人家一起哭泣,一切都只能藏在心里”。^[12]“而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她的男人苟且偷生”。^[13]安德烈把一切的罪责都归咎于战争和命运,却忘记了自己对祖国应尽的职责。出于对丈夫的爱,娜斯焦娜不能出卖他,但是面对村里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和寡妇,她深感愧疚,良心的折磨让她日夜难安,而不合时宜的怀孕将她彻底逼到了绝望的境地,公婆把她赶出了家门,本来应该为这一切承担后果的安德烈只顾偷生活命,丝毫不顾及妻子的处境。走投无路的娜斯焦娜最终选择了投河而死。娜斯焦娜为了丈夫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安德烈的不慎选择,娜斯焦娜陷入到尴尬的困境当中,夫妻伦理和社会伦理之间发生了裂痕,为了丈夫她背叛了所有人,沉重的良心负担最终导致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安德烈不仅害死了自己的妻子,也害死了未出世的孩子,他自己也终将为自己的轻率行为而受到惩罚。

娜斯焦娜的悲剧与她自身性格的软弱不无联系,性格果断坚强的女性在面临相似的伦理困境时会更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列奥尼德·连契的中篇小说《她曾是漂亮女人》的女主人公瓦列丽娅在夫妻伦理和公民大义之间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瓦列丽娅是一名生活在敌占区的普通城市妇女,她既不是地下工作者,也不是游击队员,但是她以自己的方式抗击着入侵者,直到献出生命。她的丈夫比留林是克拉斯诺达尔市地方音乐馆的演员,每次丈夫演出时,瓦列丽娅就在台上为他伴奏。城市被侵略者占领之后,比留林仍然继续登台演出,当他有一次要为台下的德国人用德语演唱一首战时士兵小曲时,瓦列丽娅停止了琴声,从舞台侧面离开了,只留下丈夫一个人在台上演唱。在德国人最后撤离之时,比留林乘坐德国人的汽车逃跑了,而瓦列丽娅则和自己的女友妮娜一起去解救被法西斯羁押的人,最后死在了德国人的

手里。

在伦理困境中做出道德上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道德选择的困难就在于人在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唯一的,“当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或同时扮演几种角色时,往往会造成在不同道德义务间的冲突”。^[14]作为妻子,她们有义务帮助自己的丈夫,而作为公民,她们又有责任履行爱国主义的公民义务,“两种义务同时作用在一个人身上,要求做出选择时就出现了尖锐的冲突”。^[15]在宗法制传统深厚的俄国,女性在家庭中一直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因此让女性做出背叛丈夫的决定必须要克服内心的伦理障碍,娜斯焦娜无力承担这一选择的后果,唯有一死以求解脱;而在瓦列丽娅的心中,对祖国的责任感和复仇冲动超越了狭隘的夫妻之爱,她离开了自己胆小怕事的丈夫,用生命证明了自己对同胞和祖国的爱。娜斯焦娜和瓦列丽娅的人生都是不幸的,懦弱的丈夫固然是导致她们人生悲剧的一个原因,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挑起这场战争的德国人。

在复仇与爱这两种道德情感的支撑下,妇女们熬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在硝烟弥漫的前线勇敢地面对敌人的炮火,在物资匮乏的后方忘我地投入生产劳动,胜利的旗帜上浸润着她们的鲜血、汗水和无尽的眼泪。在虚构的文学形象背后是千百万个苏联妇女的真实经历,那些默默无闻的女战士、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和普通的劳动妇女通

过高度概括的文学形象得以被人们铭记和感念。战争虽然已经远去多年,但是她们所作出的牺牲并没有被人们忘记,文学对这一主题的不断重复在肯定女性功勋的同时,也诉说了战争的反人类本质,美丽生命的凋零在读者心中引起的是带有痛感的怜惜与愤怒,由此而来的是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生活的珍惜。牢记历史、守护和平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后辈子孙对她们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第1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2] [4] [8] [10]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著、王金陵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142、142、100、1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3] [7] [9] [11] 斯·阿列克茜叶维契著、吕宁思译《战争中没女性》第90、219、16、17页,昆仑出版社1985年版。
- [5] 法捷耶夫著、水夫译《青年近卫军》第4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 [6] 鲍·瓦西里耶夫《和平感叹号》,见王士燮、何茂正编选《女神的毁灭——苏联新潮小说》第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 [12] [13] 瓦·拉斯普京著,李廉恕、任达尊译《活着,可要记住》第93、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 [14] [15] 余亚平等主编《伦理学》第193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书·讯

《白毛女》(特别纪念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歌剧《白毛女》自1945年首演后,受到无数观众由衷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更是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年恰逢歌剧《白毛女》首演70周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教育出版社再版歌剧《白毛女》剧本,正是希望在纪念这部伟大作品的同时,总结这部经典作品的创作经验,为文学艺术重新获得呼应时代重大问题的能力,探索出可行的路径。该书还收录了李云雷、曹景行、毛尖等学者的文章,以翔实的史料,扎实的考证,极为细致地梳理了歌剧《白毛女》诞生70年以来的改编、演出以及研究现状,并围绕不同版本的《白毛女》的艺术价值、创作经验以及当下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今后的《白毛女》研究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